

任先生与“文津讲坛”

陈荔京

时光荏苒，任先生离开我们已经近七年了。然而，任先生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，音容笑貌宛如昨日。

记得最初与任先生相识是在 1994 年。那时我刚到馆办工作，与任先生办公室相隔两三个房间。每到周一和周四，我都会看到任先生拄着拐杖，提着公文包来上班。那时候我还是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员工，只知道任先生是著名学者，内心里满是崇拜和敬仰。而真正与任先生熟识起来，是在 2000 年 9 月到国图分馆（2006 年更名为古籍馆）工作以后。因为举办“文津讲坛”，我有了更多与任先生接触的机缘。

“文津讲坛”的创办始于 2001 年元旦，在位于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分馆修缮重张之际，依托分馆的区位优势，国家图书馆决定按照雅俗共赏、普及与精深兼得的原则，面向公众推出学术文化系列讲座。2003 年元旦正式挂牌“文津讲坛”，树立起了文化品牌。讲坛坚持主讲人和主讲内容的精品意识，前来演讲的多为知名学者，有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，也有风华正茂、学术有专长的学界中坚，享誉京城内外，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品牌。

“文津讲坛”得以不断发展，声名远播，得益于任先生的鼎力支持、悉心培养。

从品牌创立、定位到规划实施，任先生都身体力行，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。他不仅率先垂范，亲自登坛演讲，还亲自指导规划讲座的选题，邀请名家。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，任先生以自身的人格魅力与学界耆宿的影响力，把众多知名的专家学者、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文化事业的人们团结、汇聚到讲坛，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图书馆学术文化重镇的品牌与形象。

任先生对于讲坛的重视，源于他对教育的重视和关心，对图书馆定位的远见卓识。他认为，图书馆除了承载人类文明，还具有教育和传播知识信息的功能。任先生在论及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时反复强调，图书馆可以补充学校教育之不足，它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，是全民终身学习和教育的基地。他认为，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不同于大学，责任要比大学大，服务的范围要比大学广，服务的层次要比大学更深。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，学校教育是主流，但这只是一个方面；更多人才资源的培养是靠社会，社会越发展进步，图书馆的作用就越凸显，我们肩负的使命和责任也越重大。

为提升文津讲坛的品牌影响力，任先生还率先垂范，亲自登坛演讲。2001年5月19日，85岁高龄的任先生以“唐玄奘取经与《西游记》”为题，做了他在文津讲坛的第一次讲座。讲座之后，任先生在留言簿上题下“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”八个字，他引用荀子这八个字，既是对玄奘为弘扬佛法不畏艰难精神的概括，也寄托了他对传承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文化品格的殷切期望。对我们而言，这也是对文津讲坛的勉励和鞭策。

自2001年起，任先生在文津讲坛共讲了七讲，其余六讲分别是“中国历史的曲折前进”、“今天看诸葛亮”、“今天看《周易》”、“汉字的再认识”、“今天看科举制度”、“中国哲学的未来”。记得其中有一次，任先生是带病坚持演讲。从任先生讲座的选题到内容，我们深深感到，任先生亲自讲课的寓意，不仅在于传承文化与学术思想的绪脉，更在于它体现了一个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，对国家和社会强烈的关切与责任感。

文津讲坛从小到大，到树立品牌，逐步成熟走向系统化规模化，任先生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。在任先生的关怀指导下，文津讲坛牢牢把握方向，坚持走精品道路。任先生以八、九十岁的高龄，亲自指导选题规划，推荐主讲人，邀请名家。他常和负责讲座的工作人员进行选题和主讲人的具体交流，可以说，文津讲坛的事情都装在他的脑子里。记得2004年元旦，任先生来分馆出席文津讲坛二百期暨回顾展开幕式，那天是厉以宁先生的讲座，我在陪同任先生参观回顾展览时，他突然提到李学勤等三位专家的名字，推荐请他们来做讲座。

在文津讲坛发展的许多历史节点上，任先生都给予了切实的指导和支持。

讲座创立的第一年，共举办了一百场演讲，我们从中选出部分内容结集出版，并于2002年元旦，举办了国家图书馆《文津演讲录》首发式暨国图分馆百期讲座。讲座最初没有名称，就叫国家图书馆分馆双休日学术文化系列讲座，在举办近两年后，决定实行品牌化，策划了一些名字，最终由任先生确定为“文津讲坛”，任先生亲自题字，我们请朱家溆先生设计，故宫制作了文津讲坛牌匾，2003年元旦挂牌举办了揭牌仪式，2004年元旦举办了文津讲坛二百期暨回顾展开幕式。每一年的元旦都要请一位著名专家前来演讲。从2002年一直到2008年，任先生每年都迎着新年的第一缕曙光，把每年的元旦时间都奉献给了文津讲坛。

任先生还是讲座最忠实的听众。有时我们在讲座厅里忙碌时，一抬头，猛然发现任先生安静地坐在后排。一次叶嘉莹先生讲宋词，任先生也是悄然而至，坐在最后一排，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他的到来。一名大学生突然认出了他，于是在讲座开始之前快步来到任先生面前，请任先生为他写一句话，任先生在他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题下“生而有涯，学无止境”，

这也正是任先生自己一生的座右铭。这句话后来镌刻在了任先生与冯锺芸先生夫妇的墓碑上。

我知道任先生眼睛不好，但有多严重，还是在任先生去世后才从一些报道中得知的：他右眼自七十年代起即已失明，左眼视力也只有 0.2 左右。我只知道若遇阳光强烈，特别是上下台阶，任先生会看不清，需格外小心。任先生经常出席一些专家学者的讲座，因其中有些学者的讲座听众太多，分馆后来将这些讲座临时安排在临琼楼的大讲座厅。任先生每次来出席，我们都会陪着他和主讲嘉宾，出了文津楼侧门，登上一段狭窄陡峭的楼梯，从临琼楼的后门直接进入讲座现场。每当扶着他上下这段台阶时，我都感到紧张，但任先生从来没有提过一句，对于一位高龄且视力不好的老人而言，任先生是以怎样的毅力克服了这些不为人知的困难！

任先生为人非常谦和、朴实、低调，不论是对员工，还是对听众和读者，老人家都体现出高度的学养与道德风范。在我的脑海里，任先生总是那幅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形象。每次来分馆，通常都是我负责搀扶照顾他，任先生看见我时，就会开心地呵呵笑着说：“你来啦”，这幅场景在脑海里永远清晰如昨，给我留下了十分温馨难忘的记忆。

记得每次讲座结束时，总有一大堆读者涌到讲台前与任先生交流，任先生都耐心地解答。还有很多人请任先生签名，考虑到任先生的身体状况，我们都会及时上去搀扶老人家回到贵宾室，让他休息一下。而读者们也都很执著，往往候在贵宾室外，我们将他们的本子递进贵宾室，任先生都会一一签上名，直到每个读者都拿着本子满意地离去。

还记得，任先生的家人和子女均曾随任先生来听过讲座，最初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任先生的家人，她们总是进入文津楼后即与任先生悄然分开，同读者一样进入讲座大厅，悄悄坐在不起眼的位置，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谁。在图书馆全面免费开放之前，讲座曾经有一段时间售票入场，她们也照常如其他读者一样买票入内。后来工作人员才慢慢知道原来是任先生的家人和子女。

记得一次周末，在讲座厅门口恰好碰上任先生的夫人冯先生和她妹妹来听讲座，那时两位老人均已八十多岁的高龄。我赶紧迎上去，一询问，才知她俩是自己打车过来的，这令我非常吃惊。讲座结束后，我扶两位老人出来，打了辆出租车，我提出要送她们，她们执意不肯。出租车远去后，我心里一直不踏实，半个小时后，我给任先生家里打了电话，接电话的恰是任先生，他呵呵笑着说“到家了”，仿佛这样的事情很平常一样。更令我深受震动的是，数年后，我偶然从一分馆老同事口中得知，他还曾经遇到过任先生自己一个人打车悄然来听讲座，并没有司机相送。

还有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。任先生曾在分馆食堂接待过一批同学，他们都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先生，一般不吃外面的饭菜。任先生给了我几百元钱，托我买些水果，我买了水果并在北海仿膳买了几盒温软的小点心，价格很便宜，大概是 15 元一盒，老先生们相聚吃得很开心。过后，我要把几百元钱如数退给任先生，说水果和点心很便宜，没花多少钱，任先生坚决不允，坚持付了水果和点心的钱。

追忆与任先生相处的日子，点点滴滴让我受益终身。他的求真，他的敬业，他的律己，他的待人，都堪为时代的表率。应当说，任先生的言传身教、耳濡目染，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难得的精神财富，我相信，也是国家图书馆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愈发感到任先生形象的伟岸，也愈发感到任先生的辞世对中国的文化学术界、对国家图书馆无法弥补的损失。时代呼唤大师，呼唤任先生这样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知识分子。

走笔至此，不胜唏嘘，谨以此短文表达对任先生的深深怀念！